

□ 王伟章

从地理昆仑到精神昆仑的整合与凝聚

——昆仑文化百年研究述评

它是山,也不仅是山;它是神话,更是文化。自20世纪初现代神话学、实证史学在中国诞生,昆仑文化研究开启了百年现代学术旅程。百年来,研究主线清晰呈现三层递进:从“中华民族共同体”到“世界文化的制高点”,再到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;议题也从“昆仑在哪儿”到“昆仑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原乡”,再到“打造昆仑山超级IP”。

发初期:
现代神话学诞生,地望与神系初辨

近代以来,西方文化大量涌入,中国传统的“天下观”受到强烈冲击。彼时的知识分子,急切需要一个能跨越时空、承载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,来接续民族文化根脉。而昆仑,作为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中记载的“帝之下都”,既有着与生俱来的地理神圣性,又有着广为流传的神话普遍性,自然而然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理想“黏合剂”。

作为近代较早将神话概念引入国内的学者之一,蒋观云在《中国人种考·昆仑山》中,广泛引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水经注》等书,结合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传》的神话传说,甚至参考婆罗门神话,对昆仑地望及民族起源等问题展开考辨。这一研究,对后世昆仑神话体系的构建、华夏民族起源的探索,都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,闻一多先生打破地域与族群的界限,将昆仑考证为“伏羲圣地”,在《伏羲考》中为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的格局找到了上古依据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,提出“层累说”,剥离了昆仑神话中封建迷信的外衣,为后人重新解读昆仑神话打开了新空间。钱穆则从文化地理角度,将昆仑山脉比作“中华文明的摇篮”,还结合闻一多的人类学、文字学研究,笃定昆仑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,让昆仑在抗战年代,完成了从“具体山脉”到“精神符号”的蜕变。从此昆仑变成抽象的专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,被赋予更为浓厚的民族精神意涵。

转型期:
民族学、考古学介入,“昆仑文化”概念提出

新中国成立后,开展的大陆神话学、西北考古、藏羌民族调查,推进研究从纯粹文献考据,转向史前文化、玉石信仰、丝路传播、河湟—羌人古史的联动考察。

而海外知识分子由于引入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,对昆仑神话研究呈现不同的面貌,在凌绝声总结出著名昆仑“七说”的基础上,有了新的学说。比如“西域说”认为昆仑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帕米尔高原,“西藏说”认为昆仑就是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雪峰,“祁连说”则认为昆仑就是甘青两省间的祁连山,此外还有“河套说”“四川说”“云南说”“泰山说”“中原说”,以及各种各样的“海外说”,为昆仑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。1962年杜而未第一次提出昆仑文化概念,尝试跳出单纯神话文学,把昆仑视为一个跨族群信仰体系。

改革开放后,学界逐步厘清《山海经》内部差异:《西次三经》《海经》的昆仑并非同一地理坐标,先秦昆仑、汉代丝路开通后的昆仑认知发生漂移,随“河出昆仑”的地理想象向西推移,和中原人对黄河源、西域、玉石之路的认知扩张同步。由于羌、藏、土、撒拉等西部族群神山、宇



昆仑山的雪融化后成为诸多河流的源头。杨晓波 摄

宙山、天梯神话,逐步纳入参照,使更多的学者意识到昆仑不只是中原典籍神话,更可以置于西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文化背景中加以认识。

进入新世纪,昆仑文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。2000年8月,海峡两岸昆仑文化考察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举行,这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昆仑神话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交流。此后一系列在青海举办的学术论坛虽以昆仑文化和西王母神话命名,却不局限于单一话题,研究视野也不断向文化认同、文明交流等领域拓展。

深化拓展期:
多学科拓展与当代价值阐释

21世纪以来,昆仑研究进一步向多学科拓展,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(传世文献+出土文字+考古实物+民族民俗田野)的运用,为昆仑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;同时,青海、新疆、甘肃成为昆仑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。青海学者系统完善“昆仑文化”理论,把昆仑神话锚定在青藏高原东北部、河湟谷地、古羌文化带,形成“神话昆仑以高原山川为原型,但超越单一实体山峰,是区域文化地理共同符号”的主流共识之一。新疆推动昆仑文化论坛、昆仑神话非遗、文旅转化,把百年学术成果转化为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标识,这也是近年研究较为鲜明的时

代转向。

站到今天的位置,随着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深入推进,昆仑文化也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明交流视野中加以审视,从而推动构建起中国和世界相结合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从学术研究走向当代价值转化,是近年来昆仑文化研究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。作者在甘青地区调查的基础上提出,可进一步加强青海、甘肃、新疆等地的交流协作,以昆仑文化为纽带打造昆仑山世界级超级文体旅IP,推动相关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活化利用,让古老的昆仑文化获得新的时代表达,实现三地文旅产业三个迭代跃升:一是由路线资源向景区实体跃升,彻底告别“零散景点串线”模式,形成西北首个跨区域、全覆盖、一体化的超级景区矩阵;二是由风景文旅向文化文旅跃升,以昆仑文脉赋能全域,补齐西部文旅最大短板,构建独树一帜的中华山水文化体验体系;三是由区域品牌向超级IP跃升,打造能够代表中国西部、对标国家文化公园层级的标杆性文旅品牌。

当然,打造昆仑山超级IP,不是简单改名包装,而是地理空间、文化体系、品牌形象、产业形态、治理模式以及西部旅游话语权的系统性重塑。通过一体统筹、文化铸魂、品牌赋能,可快速形成西北文旅最强核心增长极,为打造世界级高原文旅产业集群提供支撑。

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,穿越2200余年时光,以37字秦篆将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历史场景定格在黄河源头。作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,它不仅补充了文献中秦代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交往的史料缺环,更成为解码河源昆仑观念流变的关键实物证据。从先秦“河出昆仑”的神话遐想,到秦汉时期官方遣使的实地探寻,再到魏晋隋唐至明清的多民族互动考证,直至当代科学认知与文化认同的融合,河源昆仑观念的每一次演进,都镌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因,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,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鲜活的文化坐标。

尕日塘秦刻石:河源昆仑观念的早期官方实证与文明对话

在中华文明的早期记忆中,“昆仑”始终是地理与文化的双重符号,而“河出昆仑”的观念,早在先秦典籍中便已生根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明确记载,“昆仑之丘,是实惟帝之下都……河水出焉”;《穆天子传》则讲述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,登昆仑、会西王母、寻不死药的传说,将河源昆仑与民族精神寄托紧密相连。但这些记载多夹杂神话色彩,直至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,才为早期中原政权对河源昆仑的认知提供了实证。

尕日塘秦刻石的核心事件直指秦始皇三十七年(公元前210年)派遣五大夫率方士前往昆仑采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全涛指出,这一发现“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”,实证了秦始皇时期中原与西部的通道已打通,比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更早,是早期中华文明向西拓展、与西部族群开展文明对话的关键见证。彼时,中原人深信昆仑山上“食玉膏,饮神泉”“有不死树”,屈原在《九章》中更以“登昆仑兮食玉英,与天地兮同寿”直抒对昆仑的向往。秦始皇遣使采药的举动,正是将这种文化信仰转化为官方行动,标志着河源昆仑从神话遐想走向现实探寻。

从文明探源的视角看,尕日塘秦刻石的价值远超石刻本身。它所在的扎陵湖区域,经文物遗存证实自旧石器时代便是人类活动区域,并非“人迹罕至”。刻石中“車到”“百五十里”等文字,清晰记录了中原使团的行程与规模,说明当时中原对西部地理的认知已具备一定准确性,更反映出秦汉大一统政权对西部疆域探索的主动意识。这种探索并非孤立的地理考察,而是伴随着文化观念的传播与文明互动——刻石上提到的中原历法(“卅七年三月己卯”)、官制(“五大夫”),与西部族群的自然认知、生活方式碰撞融合,为后续多民族共同认知河源昆仑埋下伏笔。

汉唐至明清:河源昆仑观念的深化与多民族文化交融

自尕日塘秦刻石开启河源昆仑的探寻之路后,魏晋至唐宋时期,人们对河源昆仑的认知逐渐从神话想象转向实地探索,地理准确性不断提升,而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中原与西部各民族在政治、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深度互动。晋人杜预在《春秋释例》中便指出“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”,西平郡即今青海西宁,其对河源方位的判断已接近真实。自唐代以来,这一探寻进程持续深化。行动层面,逐渐从“官方主导”扩展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;认知层面,观念也从“神话附会”稳步走向“实证认知”。这一跨越千年的认知演进与实践拓展过程,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注脚。

唐代是河源昆仑认知的重要突破期。贞观九年(635年),侯君集、李道宗率军追击吐谷浑,直达星宿川(今星宿海)、柏海(今扎陵湖、鄂陵湖),“北望积石山,观河源之所出”(《旧唐书·侯君集传》),这是中原将士首次实地见证黄河源头。贞观十五年(641年),文成公主和亲吐蕃,松赞干布“率其部兵次柏海,亲迎于河源”,并以“子婿之礼”拜见护送使李道宗(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)。柏海作

为河源核心区,既是唐军征战的战场,也是唐蕃和亲的礼坛——在这里,中原的“河源昆仑”文化认同与吐蕃的高原自然崇拜相遇,“和同一家”的舅甥关系,正是建立在对这片神圣土地的共同敬畏之上。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绘制《吐蕃黄河录》,刘元鼎出使吐蕃时认定“紫山(今巴颜喀拉山)即古昆仑”,进一步将河源昆仑的地理坐标锁定在青海境内。

元代则以国家层面的科学考察推动河源认知。至元十七年(1280年),忽必烈派都实以招讨使身份勘察河源,发现“泉百余泓,沮洳散涣,灿若列星,名火敦脑儿(蒙古语‘星宿海’)",并绘《河源图》(《元史·地理志》)。都实的考察不仅纠正了“伏流重源”的旧说,更融入了蒙古族对河源的称呼与认知。同时代的朱思本从西藏高僧处获“梵字图书”,以华文译之,佐证河源出星宿海,体现了藏文文献与汉文记载的互证。这种多民族知识体系的融合,让河源昆仑观念突破单一族群视角,成为各民族共享的地理认知。

明清时期,河源昆仑观念的多民族交融更趋深入。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,拉锡、舒兰探寻河源后称“星宿海周围群山,蒙古名为库尔滚,即昆仑也”(《清史稿·舒兰传》),直接将蒙古族对山脉的称呼与“昆仑”对接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年),阿弥达“探黄河真源”,认定“阿勒坦郭勒(蒙古语‘黄金河’,今卡日曲)为黄河源头”,其考察团队中包含藏传佛教高僧,沿途祭祀青海湖、玛沁雪山等,将藏传佛教的山神信仰与中原的河神祭祀结合。雍正八年(1730年),朝廷在循化修建河源庙,“专祭河源之神”,参与建庙的有驻军官兵、土千户韩炳及各族民众,汉传佛教僧人后被藏传佛教僧人替代,庙产由地方政府供给(《循化厅志》)。从庙的修建到祭祀仪式的演变,清晰展现了汉族、藏族、蒙古族等民族在文化信仰上的交融,河源昆仑不再是中原独有的观念,而是成为多民族共同守护的文化符号。

当代回响:河源昆仑观念的文化认同价值与民族共同守护

20世纪以来,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河源昆仑的地理坐标得到较为准确的界定。1985年,黄河水利委员会确认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;2008年,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依据“河源唯长、流量唯大”原则,将正源更正为卡日曲。但河源昆仑观念并未因科学认知而失去文化意义,反而在中华文明探源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焕发出新的活力,尕日塘秦刻石的保护与研究便是典型例证。

从文明探源来看,尕日塘秦刻石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实物证据。它证明早在秦代,中原与西部的文明互动便已突破地理阻隔,这种互动不是单向的“同化”,而是双向的“互鉴”——中原的官制、历法传播至西部,西部的地理认知、自然崇拜也丰富了中原

见证『河源昆仑』观念的历史流变

尕日塘秦刻石:

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看,河源昆仑观念早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。在青海,蒙古族称星宿海为“火敦脑儿”,藏族称其为“孔雀滩”,汉族沿用“星宿海”之名,不同民族对河源的称呼虽异,却共享着对这片土地的敬畏。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后,汉族、藏族、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,延续着“守护河源”的共同传统。尕日塘秦刻石发现后,青海省将其核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,后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果洛州、玛多县政府克服“低温缺氧、无水无电”困难,安排公安与文物干部24小时值守。这种跨民族、跨部门的共同保护,正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当代的具体实践,彰显了各民族对共同文化遗产的珍视。

从“河出昆仑”的神话遐想,到尕日塘秦刻石的官方实证,再到多民族共同守护的文化符号,河源昆仑观念的流变,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。它告诉



纪录片《天下昆仑》剧照。青海广播电视台提供

的文化体系。正如赵宗福教授所言,“昆仑一直是虚与实的结合,‘地理昆仑’和‘文化昆仑’互为影响”,从秦刻石的“采药昆仑”到当代的三江源保护,河源昆仑始终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见证。它连接着先秦的神话信仰、秦汉的疆域探索、唐宋的民族交融,直至当代的生态守护,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文明发展脉络,为解答“中华文明如何起源、如何发展”提供了文化维度的答案。

我们,中华文明不是单一族群的创造,而是各民族在地理探索、文化互鉴、信仰交融中共同缔造的。中华文明的“源”,不仅在于黄河、长江等自然河流的源头,更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凝聚的文化认同。尕日塘秦刻石静静矗立在黄河源头,它所见证的,不仅是2200年前的一次官方遣使,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各民族携手前行的壮阔历史。

□ 苏勇



河源昆仑

位于格尔木的“昆仑圣境不夜城”开业现场游人如织。陈贻业 摄